

# 郑州新密出土的新砦期陶铃

汤 威(郑州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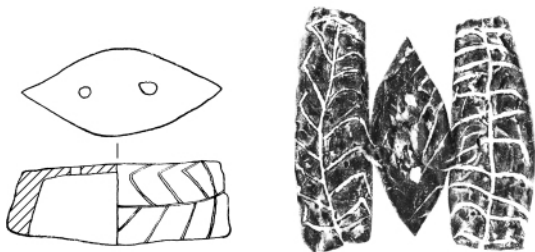
1987年9月,文物工作者在河南郑州密县(今新密市)新砦遗址采集到一枚陶铃<sup>[1]</sup>,现陈列展出于郑州市博物馆。该陶铃为泥质,器表灰黑色,陶胎较厚。俯视呈桂叶形,平顶,铃壁较直,自上而下稍外侈,无底中空,底口略大于顶部。陶铃顶部沿长轴方向,有两个不规则的圆形穿孔。顶部散刻斜线纹,四周侧壁刻划叶脉纹。高4.3厘米,顶部长10.6、宽4.3厘米,底口长11.4、宽5.5厘米,铃壁厚0.7~0.9厘米(图一、二)。

新砦陶铃为悬系铃,其顶部穿孔用来悬系铃舌和铃体。按照高炜对史前陶(铜)铃的研究成果,新砦陶铃的形制应当属于C类<sup>[2]</sup>。目前已知史前陶铃发现最多的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共出土7件陶铃,另有1件铜铃<sup>[3]</sup>。据研究,史前陶铃与原始宗教和巫术有着密切联系<sup>[4]</sup>。

新砦遗址是1964年魏殿臣等人调查时发



图一 陶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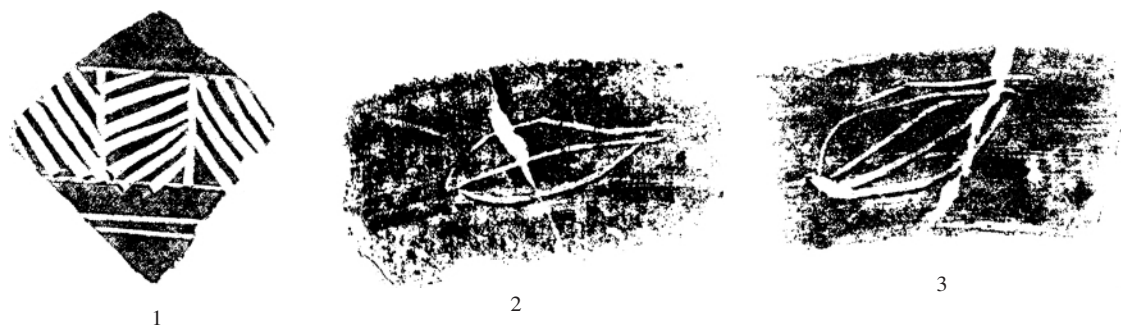


图二 陶铃及拓片(1/4)

现的,本文介绍的这件陶铃便是魏殿臣在新砦遗址采集到的。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芝荃等根据密县文化馆提供的线索,复查、试掘了新砦遗址,并且提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的概念<sup>[5]</sup>。1999年及2000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新砦遗址进行了发掘<sup>[6]</sup>,确认了“新砦期”的存在,为进一步探索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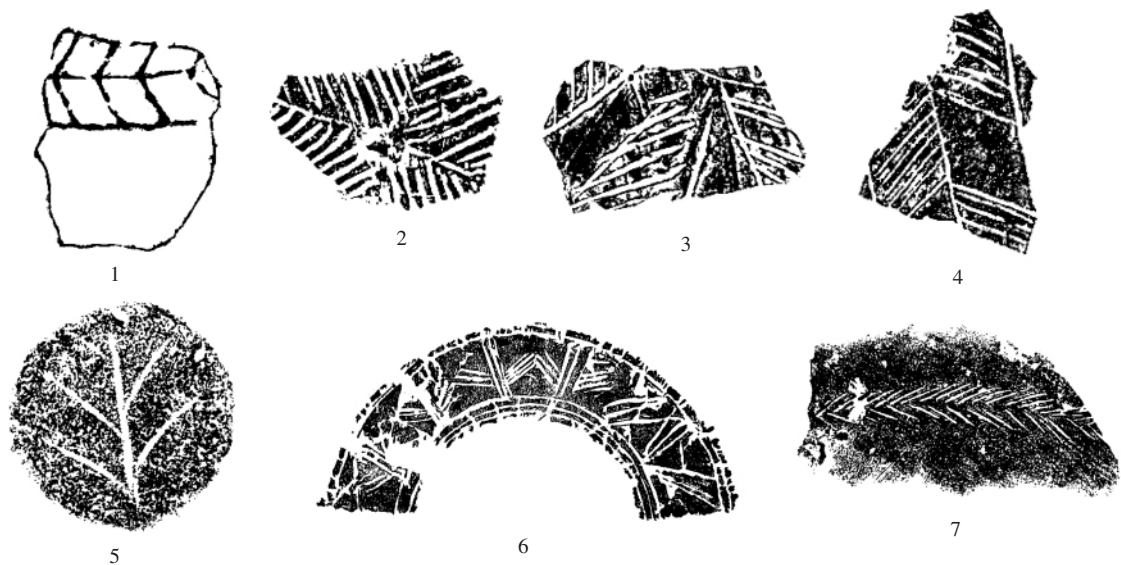
新砦遗址多年来发掘出土各类器物数千件,但目前还没有发现与这件陶铃相似的器物。不过,新砦陶铃的植物叶子形象与叶脉纹图案,与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的T4H53、T10H78中陶片上的树叶纹、叶脉纹<sup>[7]</sup>相似(图三),而T10H78、T4H53时代属于新砦一期或二期,据此我们推断,新砦陶铃应当是新砦期的遗物。

在陶器器表刻划叶脉纹的做法在海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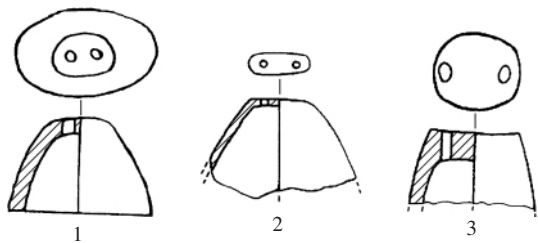
图三 2000年新砦遗址出土陶片的叶脉及树叶纹

1. T10H78:11 2. T4H53:21 3. T4H53:24(采自《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发掘考古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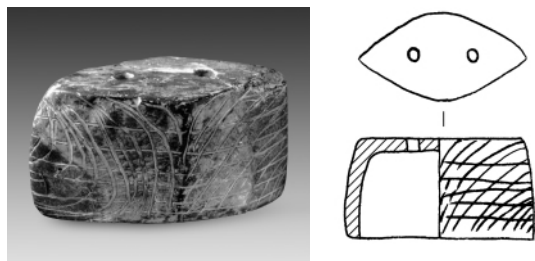
图四 海岱地区陶器上刻划的叶脉纹

1、2. 滕县北辛 3~5. 烟台白石村 6. 日照两城镇 7. 烟台芝水(采自《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胶东考古》等)



图五 大河村遗址出土陶铃

1. T13②:29 2. T11④B:11 3. T43①:4(采自《郑州大河村》)



图六 陶寺遗址采集陶铃(采自《中国乐器博物馆》)

区比较常见,如山东滕县北辛<sup>[8]</sup>、烟台白石村<sup>[9]</sup>、阳谷景阳岗<sup>[10]</sup>、潍坊姚官庄<sup>[11]</sup>、日照两城镇<sup>[12]</sup>、烟台芝水<sup>[13]</sup>等(图四)。1995~2001年,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在日照地区进行了发掘<sup>[14]</sup>,在许多龙山文化陶器上都发现了刻划的植物纹饰,

如陶鼎V形鼎足上刻划的叶脉纹,以及T2350H31陶盆残片上的枝叶纹等<sup>[15]</sup>。许多研究者认为,新砦二期陶器出现了明显的东方文化因素,如子母口瓮、子母口鼎、平底盆、圆锥形的穿孔鼎足、V形鼎足等<sup>[16]</sup>。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新砦陶铃或可归入新砦二期,它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受到东方文化因素影响的又一例证。

在郑州地区,陶铃在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已经出现。1974~1985年,大河村遗址陆续出土了4件陶铃<sup>[17]</sup>,均属于仰韶文化三期的遗物,距今大约5000~4700年(图五)。由此推测,新砦陶铃是在本地区陶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只是其形态与装饰受到了来自东方文化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新砦陶铃与在陶寺遗址采集的陶铃(06采)<sup>[18]</sup>的形态甚为接近(图六)。陶寺类型与王湾类型及其后的新砦期文化存在着怎样的文化交流,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了新密市博物馆馆长王文亮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摄影:陈巍

拓片:赵兰

绘图:丁豪

- 
- [1] 魏殿臣、秦明晓《密县新寨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陶铃》,《郑州年鉴(1988年)》,第226页,1988年。
- [2] 高炜《史前陶铃及相关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第223~241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 [3] 同[2]。
- [4]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第3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足迹——图说中国音乐史》,第3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
- [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 [7]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71、239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第175、176页,《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 [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第56、57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 [1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地区文化局文物研究室《山东阳谷县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5期。
- [1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第71、72、74、75页,《文物资料丛刊》第5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
- [12] 吴山《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第52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 [13] 同[9],第104页。
- [14] 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第4期;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1998—2001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9期。
- [15] 刘红军《日照地区龙山文化》,第116~119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
- [16] 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顾万发《新砦期研究》,《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第1439~1465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栾丰实《海岱系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第99~107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 [1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236、237页,图131—1、7、15,图版五一:2,科学出版社,2001年;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第75、7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乐声《中国乐器博物馆》,第210页,时事出版社,2005年。

(责任编辑:郑彤)